

修正主义企业管理

杀气腾腾的苏联劳动纪律

上海良工阀门厂青年工人 黄雄

如果邓小平的复辟资本主义阴谋得逞，我国劳动人民的命运将会怎样？要知道这一点，读一读本期选译的几篇透露今日苏联劳动人民苦况的文章，就可略见一斑。

看，那个新来的苏修厂长，走马上任，就把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技术人员踢出厂门，使他们‘成为流浪者’。那个苏修的农庄主席“醉心于行政大棒”；“私设法庭”，无故迫害农庄庄员。就连那个小小的苏修检查员，也可以任意闯入工人家门，因为没有见到司机执行值勤前必须‘睡觉’的规定而‘狠狠地训斥’，甚至可以下令司机“滚蛋”。再看看苏修那一套纪律制裁措施，更是杀气腾腾。谁如果在劳动中不“规规矩矩”，违反那个特权阶级的意志，就要“调去干低工资的工作，剥夺奖金，剥夺住房的权利”。这还不够，如果一班人中有一人违反了劳动纪律，那末，整个这一班人都要倒霉，“要为他所造成的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损失承担责任”。这跟封建皇朝搞的“一人有罪，九族遭殃”，跟蒋介石的“反共保甲连环保”有什么两样！

杀气腾腾的苏联劳动纪律，跟西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纪律之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苏修更其恶劣，它还要在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上面，涂上一层又一层的油彩，欺骗世人。所谓《纪律的辩证法》、《社会结构和管理的职能》等文章，就

是这一类东西。

“既然尽快巩固劳动纪律是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我们就无权忽视任何一个有益的措施。”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这是万万不能违抗的。工人要抽一支烟吗？不行！这违反“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必须扣工资、扣奖金。如果屡扣不改，那就得停职、开除。拿“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来吓唬人，说穿了，就是为了维护饥饿纪律和棍棒纪律，就是拼命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在雇佣劳动制度下，所谓“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只不过是套在无产阶级头上的锁链。在粉碎雇佣劳动制度，粉碎体现这种制度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自然会按照本阶级利益的要求，建立起自觉的革命秩序和纪律，把社会生产推向前进。我们良工阀门厂也是现代化生产的工厂。但是，过去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广大工人受压，就是要违反修正主义的‘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生产当然上不去。在一月革命风暴中，我们工人把领导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按照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办事，生产很快就上去了。十年来，阀门的产量连翻三番，品种增加了五倍。这也证明，超阶级的“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是没有的。苏修鼓吹这一套，无非是替那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提供垫脚的理论根据罢了。

社会主义社会“既无剥削阶级，也无阶级对抗，管理工作就绝不可能是一个阶级的意旨强加于另一个阶级”。这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替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所抹的一层主要涂料。他们首先把苏联说成是一个“芙蓉镇”：在那里，剥削阶级已经“消失”，阶级对抗‘不再存在’。接着笔锋一转，企业管理当然也就‘失去了阶级性’，奴役工人的雇佣劳动纪律当然也‘不再可能存在’了。可是这么一来，却彻底暴露了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嘴脸。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

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经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都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旧的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还大量存在，而且，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上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苏联的复辟，就是苏联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进行颠覆的结果。这个穷凶极恶的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就象一群饿狼，比老的资产阶级还要厉害。请看下面选译的报道，那些苏修厂长和农庄主席，不是把苏联工人农民看成“懒汉”，就是看做“贼”；因而他们手中总是拿着沙皇时代农奴主交给他们的鞭子，鞭打着苏联工人农民“好好劳动”。这些人还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至于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他们办集中营，办“精神病院”，制定法律，组织“克格勃”……，用来对付苏联人民，其凶狠毒辣的程度，比之他们的下级官吏还要厉害千百倍，就可以想见了。

“管理工作不可能成为少数人谋求私利的表现”，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新厂长”普里霍季科可以任意开除工人，佩特罗维奇可以任意把农庄庄员当做“贼”，正是由于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工人农民的权力通通被剥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大谈什么“不可能为少数人谋私利”，这叫又要做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厚颜无耻，莫此为甚！但是，苏修的一套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确实太杀气腾腾了，各种华丽的辞藻也掩盖不住它那狰狞的面目。于是，这班御用文人只好有气无力地申明，它

“完全不是什么榨取血汗的制度”，拼命要跟西方资本主义的血汗制度划界线，但却越划越糟，不打自招。“不是榨取血汗的制度”！苏修先生们，你们未免谦虚了。你们的血汗制度比起西方的血汗制度来，是更胜一筹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你们的血汗制度已‘科学化’了，象什么“科学使我们懂得，不遵守秩序，任意闲逛，比以规定的速度工作，按规定的休息，更为使人感到乏力”等等，从生理学上证明血汗制度的‘科学性’，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比不过你们的地方。

从苏修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看来，确实是“严”字当头的。他们贯彻这套纪律的班子也很‘硬’。但是，这种‘严’，不过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严重剥削的‘严’。这种‘硬’，不过是走资派对劳动人民软硬兼施的‘硬’。今天，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我国那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大叫大嚷的什么“整顿”，就是要将苏修那套修正主义‘严’字当头的杀气腾腾的劳动纪律，把苏修那套复辟资本主义的“硬”班子强加到我国劳动人民头上。但是，中国不是苏联，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我国劳动人民，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给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以迎头痛击！

纪 律 的 辩 证 法

勒 A · 多夫巴

工业生产中工作时间的丧失已在不断地减少。据统计，一九五〇年一个工人丧失的工作时间是四点六天，十年后为三点九天，到一九七〇年为二点九天。去年，已降低到二点二天。

但是很遗憾，这不是诗歌中所写的那种情况：“机灵的数字表达了意思的全部色彩”。相反，这些统计没有表达出更为重要的含义。一九七四年生产的工业品比一九五〇年增加八倍多。在这段时期内，一个工作日的价值提高了五倍多。因此，旷工、停工、请假虽已减少了一半，而所造成的损失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却增加了。

我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劳动纪律教育是时代的客观要求。什么叫纪律教育？通常认为，应该采用对工人有直接作用的说服教育、表扬和处分；但这是很不够的。

纪律同规定劳动定额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因为产量定额（或者工时消耗定额）和科学劳动组织形式的其他因素一样，直接同人有关，同人的精神、物质利益有关。如果一个定额被工人超额百分之四十到七十，那末，这个定额就不会促使人们充分地利用工作时间，因为下班尚早，每日的工资额有保证。这样定额虽有了，但对工人的要求却体现不了。相反，有技术根据的定额就不会给工人留下闲逛、闲谈或者抽支烟休息一下的空余时间。

这里所指的完全不是什么榨取血汗的制度。科学使我们都懂得,不遵守秩序、任意闲逛,比以规定的速度工作、按规定的时间内休息,更会使人感到乏力。

在一个不大的集体里,每个人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都要对其他同志负责。北方钢管厂的工长、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Ю·斯米尔诺夫考虑到这一情况,建议作出这样的规定:只要有一个人违反了劳动纪律,整个工作队都要为所造成的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损失承担责任。

应该学会在说服教育的同时,对那些不愿意尽力劳动的人运用权力。譬如说,大家知道,十个工作人员中,实际上有九个人从不旷工。如何对待那个破坏整个事业的人呢?法律规定有很严厉的制裁办法。但是很遗憾,许多企业的领导人不知为什么客气地不采用这些办法。

在一些兄弟国家内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在波兰,旷工一次,年终奖金就至少要扣除百分之二十,旷工两次要扣除一半,旷工三次就不发年终奖金。工作人员自行停止执行合同,就丧失当年的休假权利,而且到新单位后,第一年的休假期要缩短。在捷克斯洛伐克,旷工一天,休假期就减少一至两天;如果是多次旷工,就要加倍扣除休假天数。在保加利亚,那些由于违反劳动纪律或者擅自停止生产而被解雇的人,到新单位后要拿一年的较低工资。

我认为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借鉴一些可取之处。

许多先进工人说得对,诚实的劳动者不害怕任何严厉的法律。既然尽快巩固劳动纪律是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我们就无权忽视任何一个有益的措施。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忻彬译)

新 厂 长

М. 奥夫恰罗夫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来到了汽车拖拉机拖斗厂。由于这是一家不十分大的厂，因此，英诺肯季·格里戈里耶维奇刚迈过工厂大门的门槛，“新厂长来了”这个消息就立刻传遍了各车间和各科室。

对更换厂长这种事，厂里的人已经司空见惯了。当厂长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离职的原因也各有不同，而且不一定是自愿离开的。英诺肯季·格里戈里耶维奇·普里霍季科，算起来已经不知是第七位还是第八位厂长了。

全厂的人第一天就明白了：普里霍季科同他的前任不一样。普里霍季科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非常仔细地观看堆积着拖斗的极简单的平台，向工人、工长和车间主任们提了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过后，他回到办公室，把女秘书叫来，递给她一张纸。这是一张车间主任和部门领导人的名单，在每个人的名字旁边都写上准确的时间：十点二十分，十一点十五分，十二点……

女秘书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厂长解释道：“我明天要接见的人员和接见的的时间。请务必叫他们准时来。”

尽管都已预先通知了，有些人还是迟到了。他们是按习惯行事的。因此厂长没有接见他们。

“书呆子和官僚主义者！”一些人感到痛心。

另一些人说：“难道要求有秩序不好吗？听说他讲过这样的话：‘领导人的时间是宝贵的，所以我不容许浪费时间，哪怕是一分钟。’”

总而言之，似乎发生了争论……

第二天，厂长叫来了生产主任西尼亚科夫。西尼亚科夫擦着额角上的汗，匆匆忙忙地走进办公室。厂长连一口气也不让他喘：

“为什么计划不能完成？”

“没有原料。”

厂长提高了嗓音：“废话。为什么不采取措施？”

西尼亚科夫顿时觉得血液涌上太阳穴。

他低声地说：“我……我想过办法。”

普里霍季科完全发怒了：“我不能代你工作！你是生产主任！一切要你承担责任。”

西尼亚科夫激动得两手发抖。他在厂里已经工作多年，在这里可算是老资格了。可是，以前从来也没有人“这样”同他说过话。总而言之，问题不在于说这话的恰恰是厂长。也许他是对的，可是干吗大喊大嚷呢？

如果同西尼亚科夫这次不客气的谈话，就象一件偶然的、不值得注意的事一样，已不复存在，那末现在大约就不值得重提了。应当承认：这是常有的，某一个领导人动一下火，但是马上就会平息，而且会不止一次地懊悔，会在他没有善待的人面前感到不好意思。

唉，普里霍季科的任性头几天就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了。最有趣的是：他谈的事常常倒是有益的，他下的指示也是有见识的，但是这一切他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调说的，以致使得一切都落

了空。他总是对什么都不满，把坏透了的懒汉和认真工作的人“一律看待”。普里霍季科经常下车间，说实在的，这样的巡视是有效的，可是有些人竟然害怕他的访问，去参加技术会议时总是提心吊胆，因为他们知道将遭到严厉的斥责。

给人的印象是，新厂长似乎是两个人。头一个普里霍季科，是有一定学问的、善于思考的、富有主动精神的、精力充沛的工程师。他昼夜都在厂里，并严格要求部下把全部精力贡献出来，就象他要求自己把全部精力拿出来一样。厂长紧紧地抓住纪律（他说：“我们要严惩那些懒汉、旷工者和酗酒者。”），坚决地在各个车间推广机械化和自动化，用现代化的装配流水线替代那种落后的低效率的装配平台。甚至连仇视厂长的人也承认，厂里吹起了清新的转变之风。看来，新厂长正是厂里所盼望的那个人……

但是，在头一个普里霍季科背后，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形貌同他相似的人处处跟随着。此人粗暴，缺乏自制力，不懂人情，不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总是使人不好受。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个形貌相似的人几乎把头一个普里霍季科所做的有益的事一笔勾销了。

科学技术革命向领导人提出了新的高要求。是的，毫无疑问，领导人首先应当做一个博学的专家，他的手应始终按着时代的脉搏。但其他也同样重要，例如，领导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知道，他管理生产，可不是按电子计算机的键钮——他的周围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要求人家理解他们，要求人家对他们持应有的尊敬态度。

可你瞧，新厂长做事大刀阔斧，他说，哪有什么客气，工厂毕竟是工厂，而高指标全都会记录下来。但是会记录下来吗？大概最令人伤心的是，厂长的激动在各个车间里引起了反响。有

一个铰链工，是车间委员会委员，两年半内完成了个人五年计划，他对我说：

“您见过我们的车间主任吗？我早就了解他——性格稳重，待人公道。可是，得啦吧，新厂长来了之后怎么了？他从调度室回来——变得不认人了：忧郁，容易动怒。在这种时刻请不要走近他……”

集体的情绪低落了。人们开始离开工厂。厂长不加思索地在他们的申请书上签了字：“就是说，不愿意工作啦。”当然，这是些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至于那些简直毫无用处的人，不但厂长不觉得可惜，而且以后谁也不会觉得可惜。但是，在离职的人中间，有为数不少的优秀工程师、技师、设计师和工人，这可是主要的。

维塔利·伊凡诺维奇·瓦西利耶夫在工厂里从辅助电焊工升到总工艺师。以前他一切都很顺利，而现在跟新厂长却发生了不和。无论哪一天，都发生吵嘴……一有什么事，普里霍季科就大发雷霆：“您不配当总工艺师，您知道您该当什么吗？”瓦西利耶夫走了……连最老的设计师列昂尼德·帕夫洛维奇·阿尼克耶夫也走了……最后，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西尼亚科夫也走了。当然，他也不是自愿走的，不过，却是因为被提升为邻厂的厂长而走的。总而言之，走的人好象愈来愈多，而西尼亚科夫在和我交谈中有点忧郁地摇了摇头：

“是的，算啦，有什么好回忆的……只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对我来说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自己的工厂……”

在会见时，该厂过去的工人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谢尔格耶夫对我说了大致相同的话。要知道，厂里的自动焊接至今还起着作用——这是他的功劳，是他把自动焊接运用于生产的。

发生了这样的事：谢尔格耶夫由于健康状况，请求调往另

一个车间。医生们也是这样建议的。于是，电焊工去找厂长。普里霍季科疲乏地看了谢尔格耶夫一眼，漫不经心地听他说话。而办公室里电话铃又响个不停，厂长时常分心。谢尔格耶夫心里想：“他有工夫顾我吗？”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委屈地说：“我也许该走了吧。”

厂长含糊其辞地回答：“好，好。”

过了几天，谢尔格耶夫写了离职申请书，把它交给女秘书。女秘书到厂长那儿去了。谢尔格耶夫心里还抱着某种希望：也许，现在普里霍季科会请他去，好好地听他说吧？门吱扭响了一下，女秘书把已经签过字的申请书递给谢尔格耶夫。一小时之后，谢尔格耶夫得到了一张离职证明书——他平生第一次成为“流浪者”，觉得眼泪蒙住了眼睛……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苏联《消息报》

朱文娥译）

只能按照法律

第 10 · 马赫陵

努力工作、热爱土地并对集体农庄的事业忠心耿耿的佩特罗维奇，本来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主席，但是他没有……

五年前，人们选基洛夫集体农庄的兽医佩特罗维奇担任了农庄主席。大多数人对他强调秩序、极端的严厉和渊博的农业知识很欣赏。农庄也正好需要这样的主席。

前任主席向佩特罗维奇移交时，客气点说，农庄的情况不是最妙。使新的主席感到愤怒的不仅是经济指标低，更重要的是劳动纪律极差，酗酒、盗窃公共财产的事不断发生，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给农庄造成了巨大损失。佩特罗维奇意识到：必须坚决打破这类‘秩序’。

人们马上觉察到：新主席的眼光十分敏锐，什么都逃不过他。有些队长、工段长、高级专家对这种或那种不守秩序的现象都无动于衷、习以为常了。佩特罗维奇却不是这种人。他从不放过哪怕是一点小小的错误，也不饶恕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有一次，佩特罗维奇驾着车子行驶在田间宽道上。他赶上了一位母亲和女儿……她们请求搭车回村去。主席把车子停了下来，但他不是因为她们要搭车，而是看到了她们手里捧着一包甜菜，心里充满了愤怒。这妇女一下子还不明白，为什么那时佩特罗维奇如此愤怒？正如大家所说：面色大变。妇女开始辩

解：“一共只拿了五棵！”佩特罗维奇夺下了赃物，开始训斥女庄员，使她羞愧得无地容身。

“五棵加五棵——就是十棵。今天十棵，明天，……我说的不仅是拿几棵的问题，……你给女儿做出了什么榜样？她连数数还没学会，你已经在教育她：拿吧！集体农庄的东西，没关系！”

哎呀，这样的事主席碰到可多啦，简直伤透了他的脑筋！有的人擅自用马车把割下的麦草运走，有的人整袋整袋地把打麦场上的麦子拿走，还有的人费力地拖走配好的饲料或青饲料。……小工厂运来了金属配件——金属配件不见了。报废了的拖拉机拖斗底板送到小工厂，准备为女挤奶员造亭子——拖车底板失踪了。

还有，在畜牧场里，由于饲养员、畜牧技术人员和队长的过失，发生了牲口大批死亡的事故。

是的，看到这一切，使主席热爱集体的心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正义的愤怒。这时，佩特罗维奇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这样，基洛夫集体农庄前任主席的态度是极其明确的：必须坚决消除败坏村庄名誉和给它造成不小的物质上和巨大的精神上损失的现象。必须采取正确、可靠、有效的手段。什么样的手段呢？

照理，主席手里有许多同各种违法现象作斗争的方法。法律规定：对农庄造成的物质损失必须予以赔偿；调去干低工资的工作；剥夺奖金；剥夺登记住房的权利等等。道德感化对玩忽职责者的威力也很大：生产队、牧场、村庄的公众舆论的力量是众所周知的。这一教育人的民主方法是农庄制度的基础，它同命令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最后，农业领导人在同盗窃公共财产的盗贼，在同那些给农庄造成物质损失的人的斗争中还有着忠实的同盟者——民警和

司法机关。

然而，佩特罗维奇忽视了用这些合法的手段来感化那些损人利己和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他竟然不把材料转交给侦察机关，而是私设法庭，根据自己的看法作出判决。他的看法就是：即使违反法律也要严厉地惩罚每个人，这样才能吓唬人，使人望而生畏。

还记得不见了金属配件那件事吗？佩特罗维奇知道了这件事后，叫来了两个有盗窃嫌疑的庄员，立刻进行了非法审判。“贼！”——他向大家宣布说。仅就这一件事而论，主席已经粗暴地破坏了法律，因为按照法律只有人民法庭，而且只有法庭才有权给公民判罪。先于法庭或者不通过法庭，任何人都不能判定一个公民有罪，不管事实是多么确实。

法律规定了审理案件的严格程序。法律是英明而又慎重，关心备至而又至高无上的。因此，双方的辩论极重要，要求证据，证据！佩特罗维奇轻率地判了两个庄员犯有盗窃金属配件罪，并决定向他们追偿二百多卢布。但是，不久却捉到了真正的盗窃犯……

向无辜的受害者退回了非法扣除的钱。这样，物质损失是偿还了，但要知道，苏维埃公民的名誉和尊严却受到了损害！

在拖拉机拖斗底板的失窃案中，正直的波波夫在精神上受到了更大的损失。当佩特罗维奇一知道拖斗底板失踪，就宣布波波夫是贼，并解除了他的小工厂主任的职务，还从他的工资里扣除了一百五十卢布。接着，佩特罗维奇命令总工程师搜查了一些人，后者也这样做了（虽然很清楚：只有得到监察员同意的专门被授权的人，并有证人在场时，才有权采取这种行动）。工程师在一个庄员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底板。但是，甚至在这以后还不撤销对波波夫的判决，任意扣留的钱没有归还，也没有恢复

工作。

主席在处罚人时，一次也没想过：“我这样做对别人的利益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一点，共产党员波波夫不久前曾提醒过：

“对我是莫大的耻辱！女儿流着泪走到我跟前，轻轻地问：是吗？爸爸，难道你真的偷了？一年来我总是绕道经过管理处。为此，我至今还感到痛心……”

农庄管理委员会会议变成了法庭，每次开会都对十至二十人作出现金扣款的决定。数额在三十至二百五十卢布之间。近两年来总共有二百四十人受到了这样的处分。

我们知道，佩特罗维奇的观点并不新鲜。从前有过，今天还常可从其他一些农业领导人——严厉的行政手段的捍卫者那里听到。如果听信这些人的话，那末惩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效。惩罚要严厉、迅速，甚至不惜违法。“这样，教育的作用就大啦！”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王建国译）

被怀疑的休息

苏 II · 科里亚金

电气列车的副司机必须在晚上六点钟以前去上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开车的时候保持充分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他总是早早地吃好午饭就躺下睡觉。这一天他也是这样做的。他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起床，准备去上班。

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主人说：“请进来！”

机车库的检查员出现在房门口。他没有问好就说：“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为什么不睡觉？！谁给你违反条例的权力？”

副司机老老实地回答：“我刚刚睡醒。”

检查员吼道：“撒谎，你有什么证据？”

被怀疑违反条例的铁路员工抱怨说：“这还需要什么证明呢？如果我说睡过了，就是睡过了。而且我的孩子还可以证明。”

“小孩子不能作证！”检查员一边回答，一边在自己的检查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开完车回来，没有出任何事故。机车库副主任召开业务会议，只是因为检查员没有碰到这个副司机在睡觉，就将他作为故意违反纪律的人而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副主任说：“你们人太多了，我们无法看着每个人睡觉。因此，今后我们将采用抽查的方法。我们有言在先：如果谁不遵守条例在家里睡觉，就叫他滚蛋！”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苏联《消息报》房树译）

劳动纪律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

〔苏〕 A·皮亚塔科夫^①

培养工作人员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尽一切可能加强纪律，提高他们对执行其劳动职责应负的责任，这一切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科学技术进步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不仅对工作人员的专门技能，而且对劳动纪律性和组织性都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否则，我们就简直无法解决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大量极为复杂的任务。由此可见，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对挖掘巨大潜力具有重大的意义。苏共中央告全党、全国人民书曾经号召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潜力，特别强调指出，不断加强劳动纪律，减少停工时间，节约劳动时间，更有效地使用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同提高生产效率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还指出，目前仍然发生着不少造成损失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干部的流动性也很大。要把所有劳动集体的纪律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按照示范条例的规定，每个工作人员对劳动必须采取踏实、认真的态度，必须及时地认真执行行政领导的命令和指定的任务，完成生产定额和工作定额，全部工作时间用于生产劳动，遵守技术操作规程，避免在劳动中出废品等等。但是现在已不能

^① 作者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法学家。